

導 論

中國能否實現四個現代化，以及如何、何時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些是每個中國人所關注的問題。

◎ 「三體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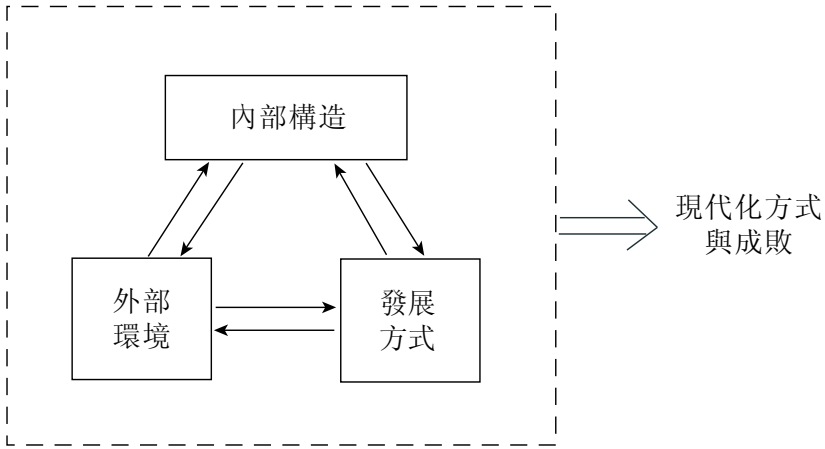
實際上，上述問題的答案，首先與當前中國正在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具體內容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但卻遠不是它所能獨立地予以解答的。另外還有兩個基本問題也對上述問題的答案有著不可忽視的重大影響。其一是中國應該選擇一種什麼樣的長期發展方式——這是本書的主體；其二是中國應該在國際經濟、政治和戰略格局中扮演何種角色，發揮何種作用，受到這種國際大格局的何種影響，以及中國應該如何處理國際關係，使其向有利於自身的方向演進。

應該說，這個「三體」問題——中國的外部環境、內部構造以及它的目標和演進軌道——的綜合解，直接決定了中國現代化的方式與成敗。在這「三體」之間既有相互聯繫的側面，又有彼此獨立的內容（見圖~1）。

例如，即使找到了一種合理的體制，但如不能尋求到

一種合理的長期發展方式，中國的現代化能否成功仍是疑問；即使在這兩個方面都有正確的選擇，但如在國際關係方面出現重大決策失誤，也會使中國的現代化難以成功。

圖~1：「三體問題」圖示



在內部構造方面，我們自己的經驗和教訓已充分證明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儘管如何做出正確的選擇還遠未完成，但另外「兩體」還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當然，僅僅從我們自身的經驗來看，確實還難以說明這「兩體」的重要性，以及相關的錯誤決策的災難性後果。為此，必須從世界各國發展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中吸取更多的教益。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非西方欠發達國家以西方發達國家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方式（我們稱之為經典的發展方式）為楷模，採取了對西方開放、引進國際資本、輸入西方科學技術和以經濟增長為優先目標的一系列發展政策。許多西方發達國家還在聯合國的主持下，在技術、資本和資源等方面給非西方欠發達國家以較大的援助。從1960年至1970年，許多非西方欠發達國家也確實

實現了經濟（確切地說是國民生產總值——GNP）的大幅度增長，其年平均增長率達到5.2%，高於同期發達國家的4.9%。^①

但是，一個明確的事實是，GNP雖然增長了，經濟結構（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方面的）卻日益惡化了。這主要表现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儘管有些欠發達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已經縮小，但大部分窮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無論是在名義收入還是在實際收入上都變得更大了。第二，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甚至在製成品出口貿易方面也處於不利的地位。第三，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幾乎滲透到欠發達國家的每一個經濟部門，控制了欠發達國家的許多經濟命脈。第四，發達國家的任何一種經濟波動和不景氣，都可以通過國際貿易和跨國公司的活動，成功地轉嫁給欠發達國家，使欠發達國家蒙受鉅大的損失。第五，欠發達國家的外債負擔日益加重。^② 總之，絕大多數非西方欠發達國家30多年來的發展實踐證明，經典的發展方式對於它們來說是行不通的，而且通過實施這種發展方式，一個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以不合理的國際分工為基礎的世界經濟格局已經形成，它正成為欠發達國家自身現代化發展的嚴重障礙。

鑒於這種歷史經驗，可以有以下幾點重要的判斷：

第一，在這些欠發達國家中，意識形態各異，經濟和政治體制也不同（其中不乏採用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但普遍採用了經典的發展方式，結果是平均成績不佳。由此可見，發展方式的選擇有其獨立的意義，並不會因政

① 嚴立賢：〈依附理論述評〉，《國外社會科學》1988年第4期，第13頁。

② 嚴立賢：〈依附理論述評〉，《國外社會科學》1988年第4期，第18頁。

治、經濟體制的選擇而自然地解決。

第二，我們不可能指望發達國家採取一種寬宏和真誠援助的態度。撇開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經濟體制這些因素不談，在發達國家之間存在著一種戰略上的默契，即維持乃至強化歷史上形成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格局——這是它們共同的根本利益的核心和要害，因為這樣最有利於保持它們的優勢地位。儘管這些發達國家之間同時存在著激烈的衝突和爭奪，但在上述根本點上，它們並無二致，而會聯手與欠發達國家作戰。如果認為，發達國家會幫助欠發達國家強大起來（儘管在發達國家中確有少數這樣的政治家），那就未免過於天真了。在這種性命攸關的要害問題上，發達國家的絕大多數政治家、企業家，是從不會含糊和動搖地，他們的基本哲學觀點十分明確，那就是：弱肉強食。

在生態學中，捕食者（如狐狸）和被捕食者（如兔子）的模型從唯象的角度對上述現象做出了形象的說明。因此，發展中國家要想獲得長足的發展和進步，必須想辦法扭轉自己在國際經濟格局中所處的不利地位——被捕食者的地位。戰後 40 多年的歷史經驗表明，大多數欠發達國家的開放方式並不成功。儘管它們早已實現了不同程度的對外開放（不少國家還相當徹底），但對自身不利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格局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有所強化。這種深刻的歷史教訓非常值得我們重視，那就是不同的開放方式的後果是極不相同的，甚至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因此，問題不能僅僅歸結為是否對外開放，更為重要的是如何開放。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欠發達國家採用何種方式處理國際政治經濟和戰略關係問題，有其獨立的重大意義。當前，所謂的南南合作，以及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各種呼聲和活動，說明了欠發達國家的覺醒：必須調整自己的

對外開放方式，加強相互間的合作，打破那種已經形成的、存在很大慣性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關係格局。

第三，西方的現代化理論認為，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具有同樣的歷史，都要經過傳統和現代化兩個階段，二者的區別只不過是有先有後，時間有長有短而已；而依附理論則認為，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雖然都曾經有過「未發展」的歷史，但從前者開始進行殖民擴張，並將後者納入自己的影響範圍以後，便開始了完全不同的歷史，前者由「未發展」階段進入了「發達」階段，而後者則由「未發展」階段進入和「欠發達」階段。^③

這種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可由現代數學中的分歧理論作出唯象解釋：非線性系統對初始條件極為敏感。也就是說，早發達國家由於特定的初始條件，以經典的發展方式實現了現代化，而這個過程恰恰又使上述初始發展條件不復存在。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多數欠發達國家所面臨的初始條件已和一二百年前大不相同。當前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格局中所處的主導優勢地位，已成為欠發達國家目前所面臨的新初始條件的重要部分。我們猜測，二次大戰後大多數欠發達國家在進行自身現代化的過程中屢受挫折與此有著重要的聯繫。

至此，可以引出一個自然的判斷：面對當前不合理的國際經濟關係，大多數欠發達國家不僅要改變自己的對外開放方式，同時也要相應地調整自己的發展方式。這就說明了在對外開放方式和自身發展方式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

總之，欠發達國家，特別是中國，在上述「三體」問

③ 嚴立賢：〈依附理論述評〉，《國外社會科學》1988年第4期，第13頁。

題上，同時面臨著鉅大的變革任務。充分吸收二次大戰後欠發達國家的歷史教訓，在上述幾個方面及其關係上少犯同樣的錯誤，將會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產生鉅大的促進作用。

◎ 艱辛探索

我們研究發展方式的最初想法可以追溯到 1984 年底。當時我們明顯地感到中國的現代化既不應該，也不可能走發達國家的老路——經典的發展方式。同時，我們還隱約地感到，當時在國內比較流行的、以滿足人民基本需要為主要目標的發展方式，對於實現中國的高度現代化，也存在著很多缺陷和不足。正因為這樣才促使我們開始對這一基本問題進行研究。實際上，對於中國而言，現代化並不僅僅是意味著達到既定目標的綜合取捨（這當然包括對現代化過程中的很多表象進行識別和揚棄），以及對實現這些目標的發展方式或道路的選擇。

為了看清這些問題的意義，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大多數不發達國家戰後 40 多年的時間裡，在選擇發展方式中所經歷過的艱辛歷程。

所謂經典的發展方式，簡言之就是以大量耗用不可更新的資源為基礎，以大批量生產的存量型技術為手段，千方百計地增加 GNP，以實現國家的富裕和繁榮。這曾被視為普遍適用的法則。

在整個 20 世紀 60 年代，多數不發達國家自覺或不自覺地實行著這種發展方式，它們往往片面地追求提高 GNP，希望以此早日實現工業化，因為在它們前面的成功者無一例外地走的都是這樣一條道路。它們當中很少有人能夠正視這種發展方式所帶來的隱患。

然而，事實無情地粉碎了這種幻想。由於在 60 年代普遍採取了這一發展方式，結果帶來了令人心傷欲碎的局面：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和國家內部貧富懸殊的加深。1960 年，不發達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人均 GNP 就已存在不小的差距，當時發達國家的人均 GNP 已達 2408 美元，而不發達國家僅有 207 美元，後者僅為前者的 8.6%。到了 1969 年，情況並不像人們原先想像的那樣變得好起來，而是變得更加糟糕了。這時發達國家的人均 GNP 已激增至 3528 美元，而不發達國家只增至 275 美元，後者為前者的 7.8%。這使不發達國家極為沮喪，但也使它們的頭腦開始清醒起來，對沿著經典發展方式的老路能否走得下去產生了懷疑。

容易看出，不發達國家之所以在整個 20 世紀 60 年代發展緩慢，窮國和富國之間的差距之所以日益擴大，其原因在於不發達國家所面臨的條件有了極大的不同；同時，不發達國家的內部構造（例如，經濟和社會的基礎結構）與這種經典的發展方式很難相互適應。

在前文中已經說過，不發達國家在二次大戰後首先做出的選擇是實施經典發展方式，儘管有極少數國家以此獲得了較大的成功，但大多數國家則以失敗告終。隨後，約在 20 世紀 70 年代初期，大多數欠發達國家放棄了這種發展方式，轉向了以滿足大多數人的基本需要為主要目標的發展方式。這種發展方式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提高 GNP 的增長率上，而是強調每人攝取熱量、預期壽命和識字率等一系列的綜合指標。這種以廣大人民最低限度基本需要為主要目標，而不把趕超哪個國家放在重要地位的發展思想，是想引導欠發達國家走向更為切合實際的發展道路。試圖把基礎牢牢地建立在滿足大多數人基本需要之上的這樣一種發展方式，被稱之為滿足基本需要的戰略。根據這

種基本想法，出現了一種衡量發展的所謂 ASHA 指標。

這種指標包括：就業率 (A)、識字率 (B)、平均預期壽命 (C)、年均 GNP 增長率 (D)、出生率 (E) 和嬰兒死亡率 (F) 等六個參數，可用來規劃一個國家當前應該如何發展，並在發展過程中有助於搞清楚要滿足基本需要還得走多長的道路。具體的 ASHA 的指標值是用下述公式計算的：

$$ASHA = \frac{A \cdot B \cdot C \cdot D}{E \cdot F}$$

有人曾給這六個參數分別設定了具體的數值：年均 GNP 增長率為 3.5%，就業率為 85%，識字率為 85%，出生率為 2.5%，嬰兒死亡率為 5%，平均預期壽命為 70 歲，則 ASHA 指標設想值為 1416。有些人還建議，所有欠發達國家都應該通過改善他們的就業、教育與衛生保健等發展規劃，使之在 2000 年達到 1416 這一 ASHA 指標設想值。

他們指出，如果欠發達國家不是片面追求 GNP 的提高，而是選擇全面發展的道路，即改革社會制度，實現社會公平，既規定合理的 GNP 增長率目標，又注意發展文教、衛生保健和其他福利事業，那麼只要有八百美元的人均 GNP，就能達到 1416 這一典型的 ASHA 指標值了。但如果單純追求經濟的發展，則要有二千美元的人均 GNP 才能實現這一數值。

在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一些國際援助機構和第三世界國家政府，以及國際勞工局，日益重視並推廣基本需求方案。這種方案的宣傳者引用強調基本需要的古巴、斯里蘭卡、中國等國家給人印象深刻的平均預期壽命、識字率及營養狀況等來支持自己的觀點。

雖然在健康、營養、教育和住宅等方面的投資對窮

人的福利和經濟增長有重大的意義，但基本需求方案的實踐要求欠發達國家必須注重建立經濟基礎以為這些活動提供資金。於是到了 80 年代初，許多經濟學家又一次更多地強調經濟增長及不同類型的發展活動（如對水利和健康設施的投資）的先後順序。這一重點的改變並不意味著放棄 70 年代公平發展的宗旨，而是反映了對這樣一種不可能性的進一步認識：即在一個貧窮的國家裡，僅靠重新分配現有財富而讓迅速增長的人口的大多數過上像樣的生活是不可能的。這種認識導致世界銀行在 80 年代初轉向更具增長導向的方式，而基本需求方案則漸漸不受重視而隱居幕後。^④

總之，從當前的情況來看，注重基本需求的發展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總的來說，並不十分突出。欠發達國家在一系列根本性的問題上，特別是在普遍的貧困問題上，並沒有隨之得到較好的解決。因此，目前這種發展方式漸漸不受重視，而強調經濟增長的看法又開始活躍起來。儘管這種發展方式並未取得預期的成效，但我們認為其基本思想卻有著十分積極的含義和鉅大的合理性，它使人們第一次看到了另外一種發展方式的可能性，可以說它是我們在後面將要詳加分析的新發展方式的先驅。

進入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強調經濟增長的看法和做法又逐漸居於主導地位，具體地說就是走新興工業化國家的道路成為一種理論和實踐上的時尚，在後面還要對此專門加以分析，這裡僅看一下這種道路的具體實績。

20 世紀 80 年代世界經濟活動的特點之一是：南方發展經濟的條件日益惡化，南北方貧富的差距明顯拉大。在

④ 約翰·斯塔茲、卡爾·艾切爾：〈農業發展觀的歷史考察〉，《經濟學譯叢》1987 年第 11 期，第 42 頁。

這十年間，發展中國家除了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外，南亞、中東、黑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速度都比 70 年代低。而且不少發展中國家由於人口增長速度超過了經濟的增長，現今的人均收入水平低於 80 年代初期。例如，在拉丁美洲，1980 年人均國民收入曾達到 2010 美元，而到 1988 年卻降到了 1800 美元。在非洲，1980 年以來人均國民收入已下降 20% 以上。與發展中國家不同的是，北方發達國家自 1982 年走出衰退後，經濟連續七年增長。它們的人均國民收入從 1980 年的 1.065 萬美元上昇到 1987 年的 1.458 萬美元，增加了約 40%。同期，發展中國家的人均國民收入只從 680 美元增加到 720 美元，增加了不到 6%。如果除去亞洲，其他地區的人均收入實際是下降的。從南方國家內部看，經濟發展受挫的主要原因是經濟發展戰略及經濟政策的失誤。例如，拉美國家借債曾帶有一定的盲目性，面對這些情況，不少發展中國家在 80 年代雖然開始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由於存在嚴重不利的外部經濟環境（如發達國家加強了貿易保護主義），改革的成果到目前為止還是有限的。^⑤

隨著工業發達國家於 80 年代初擺脫了能源危機，北方在南北關係中的態度已比 70 年代強硬。在烏拉圭回合的談判中，發達國家在農產品、紡織品、技術轉讓等與發展中國家關係最大的領域中均持強硬立場，使南北方在貿易方面的對話陷入僵局。另外，發達國家在這十年裡利用國際融資、市場、技術、生產資料、糧食等方面的優勢，對發展中國家施加壓力並進行分化，迫使南方增加對北方

⑤ 劉昕：〈南北貧富差距擴大的十年〉，《人民日報》1990 年 2 月 2 日。

的依賴。^⑥

總之，戰後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情況表明，我們在「三體問題」一節中所提出的幾個判斷的重要性和正確性，也就是說除了其他兩體問題，發展方式的問題具有獨立的重要地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如不能找到一種適當的發展方式，它們的未來前景將是黯淡的。

中國的情況則有些特殊。自1949年以來，我們的發展戰略屢經變更，但重視解決人民的基本需要則始終被置於較高的地位。同時，從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來看，原有的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解決普遍的貧困問題上是卓有成效的，但在解決普遍富裕和高度現代化的問題上則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和障礙。對此，很多人把問題的癥結僅僅歸結為原有的經濟體制。但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這個問題並不如此單純，而是要複雜得多。

當今中國90%以上人口的溫飽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因此，以滿足大多數人的基本需要為主要目標的發展方式已無很大的用武之地（但是這種方式所提出的綜合發展、適度增長等基本思想卻並未過時）。而二次大戰後大多數欠發達國家採用經典發展方式所經歷的悲劇又給我們敲響了警鐘：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方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面臨著一次新的重大抉擇，即用何種發展方式來實現高度現代化？我們是否會重複那些欠發達國家的歷史悲劇？中國能否成為一個新的例外：沿用經典發展方式實現高度現代化？如果不能，那麼替代的發展方式又是什麼？對這些問題做出分析和判斷，構成了本書的主要內容。

^⑥ 劉昕：〈南北貧富差距擴大的十年〉，《人民日報》1990年2月2日。

◎ 全書鳥瞰

全書共分十一章。第一章分析了中國經濟長期發展所面對的物質約束和發達國家生活方式的「示範」影響，通過國際比較研究表明，我們無法依靠經典的發展方式實現自身的現代化。本章明確地提出了中國在物質制約和「消費示範」的雙重壓力下推進現代化的進程中，面臨著選擇和確立新長期發展方式的根本問題。

第二章對經典發展方式的若干重要特徵和後果進行了認真的反省。顯然，這是對新發展方式進行全面探討的前提之一。該章揭示了經典發展方式的根本弊端在於：經濟的需求的背後隱藏著鉅大的「經濟性」浪費——經濟增長中的揮霍性因素。

第三章對自然資源的類型及其技術和社會性質進行了討論，這是為第四章的主題——經典發展方式的成因——提供一些必要的分析概念。因為經典發展方式的產生和形成，是以那些少數最早發達起來的國家當時所處的一種獨特的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資源狀況及其實際佔有格局——為前提的。

第四章對經典發展方式的生成原因、制度構架、運行機制、調節方式、長期後果和理論基礎進行了較全面的分析和概括。並揭示了這種發展方式的載體——市場機制與私有制結合而成的經典體制——在資源的配置和利用上所存在著的根本缺陷，即人類系統的時間尺度與存量資源形成的地質時間尺度之間存在著數量級上的鉅大差別（現有的資源分配制度中基本上沒有表現這種差別的機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嚴重後果。

第五章對熵的各種含義做了盡可能清楚地說明，並據此討論了經典發展方式與自然環境的關係。通過分析表

明，以人造物質財富過度增長為主要特徵的工業化社會，由於破壞了自然界的水氣循環和生物循環，所以難以逃脫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約束，它的停滯是必然的。

第六章對經典發展方式的表現型——以GNP為核心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做了較為詳細的清理，指出人們津津樂道的很多「進步」都是在透支的煙幕下獲得的。並對伴隨這種發展方式幾百年演進過程中所形成的西方文化中的糟粕進行了一定的清算。該章還提出了新發展方式的資源與技術的基礎，及其與古老文明的相互關係。

第七章對恩格爾定律的微觀基礎做了詳細的解析，從中引出了一些有用的分析性概念和結論，為下一章的討論做了工具上的準備。

第八章給出了新發展方式的哲學背景和理論基礎，得到兩個非常重要的結果：廣義恩格爾定律和等效性原理。從中引出一個最重要的推論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在超越了基本需要滿足階段之後，可以主動地選擇物質消耗程度較低的滿足手段，而不會降低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水平和質量。

第九章通過四個準則，在實踐的層次上對新發展方式的特徵進行了綜合與概括，試圖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提出新發展方式在中國運用的原則、方針和標準。該章導出了一條廣義能級匹配法則，並用其對各種目的與滿足手段之間的匹配問題進行了分析和評價。

第十章從衣、食、住、用、行、醫和三大產業這樣一些更具體的層次，提出了新發展方式在中國如何運作的一些對策性建議。並根據現代化的十條標準，將我國的現狀與之做了綜合的比較，然後分析了第三產業和城市化這兩個薄弱環節以及未來的城市化形態。最後，該章指出，建立在事實和科學基礎上的信念，對於支持我們在社會、政

治、經濟和文化等各個領域中進行持久的艱苦努力，是至關重要的。

第十一章對新發展方式的基本構架作了概括，將其歸納成七個方面的特徵，提出了我國在向未來過渡的進程中應該如何行動的一些方法和原則，並對實現最終目的的主要手段、以及妨礙我們採取正確行動的某些流行看法進行了簡要的討論。